

买卖不成仁义在：互联网技术 影响下平台家政小时工的社会网络变迁

梁 萌

内容提要 互联网深度嵌入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和生产后，全面重塑了他们的社会网络。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比较平台家政小时工在常态化和疫情中社会网络（强关系、中间关系、弱关系）的特征及其变迁。研究发现，在常态下互联网技术在生活和生产中的深度使用使流动人口特别是平台劳动者的社会网络呈现两极化特征，强关系更强，弱关系更弱，特别是在城市社会网络中弱关系更表现出解构化的趋势。而在疫情下平台劳动者的弱关系由“人走茶凉”的经济理性关系转变为“买卖不成仁义在”的道义责任，从而成为助其渡过难关的主要资源。研究者需要反思社会网络研究既往对各类关系间平行且独立的互动机制的预设局限。

关键词 互联网技术 家政小时工 社会网络 平台劳动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手机网民规模8.9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2019年，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行政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6.2%，较2018年底提升7.8个百分点，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缩小5.9个百分点，数字鸿沟进一步减小。庞大的网民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用户基础。在生活方面，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10亿，2019年交易规模达10.63万亿元；而在就业方面，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为各行各业创生出新的生机，成为解决就业、影响国民生计的重要动力来源^①。因此，从我国互联网发展趋势来看，互联网技术已经全方位地深入到国民生活、生计的各个方面，成为经济社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45次），2020年4月28日，http://www.cac.gov.cn/gztt/ztzl/zt/bg/A0920010206index_1.htm，2020年11月1日。

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要素。

具体到社会层面，互联网技术也在通过影响个体间的信息流通和互动模式而逐渐形塑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卡斯特（Castells）在《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一书中提出“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是由基于微电子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动的网路组成。通过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对人类在生产、消费、再生产、经验以及富有意味的文化交流中所表达的力量等方面的组织安排有所了解。”^①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所具备的开放性、流动性的特性，解构了原有媒介话语霸权而赋予网络中个体知情权、话语权^②；另一方面，也基于与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互构，而造成了“数字鸿沟”这一技术可及性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技能偏向（高技能者收入提高，低技能者收入下降）问题^③。由此，可以看到互联网技术对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类群体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甚至会造成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延续或扩大。而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微观的个体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也随之变迁。

在这一背景之下，社会科学更加关心处于社会弱势位置的相关人群，其中有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变迁问题即为其中的核心讨论议题之一。早在互联网在国内普及应用之前，流动人口相关研究就伴随着改革大潮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体量流动到城市而兴起，学者们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流动现象进行了持久和深入的讨论，社会网络等问题即为其中的核心议题。已有研究已经发现，互联网技术尚未普及之前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无论是相比于农村留守人群还是城市居民，都呈现出鲜明特征^④。那么在互联网技术深度嵌入的社会背景下，以平台劳动为业的流动人口社会网络会呈现哪些变化，特别是结合疫情的特殊情境又会使我们对其特征有哪些新的观察与认识，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一）社会网络概念及实证研究

社会关系网络的相关研究首先起源于格兰诺维特于 1973 年提出的“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理论^⑤，主要指代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一组关系或联系，

①（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

② 杨乐怡、钟大年《“关系技术”：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化内涵》，《现代传播》2019 年第 12 期。

③ Berman, E., Bound, J., & Machin, S. J., “Implications of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3, issue 4, 1998, pp. 1245 - 1279; 潘丹丹、王子敏《互联网、技能偏向与劳动力区域流动模式研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 年第 4 期。

④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2 年第 4 期。

⑤ Granovetter, Mark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issue 6, 1973, pp. 1360 - 1380.

透过这一关系可以看到行动者的社会结构位置^①。林南提出社会资本就是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获得的资源，也即按照这一观点，个体层面上的社会资本实际上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②。因此，对相关群体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展开探索和测量。

其中最为人说熟知的当属格兰诺维特在求职研究中有关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讨论。在一项针对白领求职的调查中，他发现大多数工作变动是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实现的。在这里，格兰诺维特将强关系定义为亲密的关系，包括亲戚和朋友等互动较为频繁和深入的人群，而弱关系则是指较为松散的泛泛之交，例如工作中有往来的人和熟人等，二者主要的区分标准在于感情亲密程度和交往的频率。而弱关系之所以更有利于就业就在于关系间的行动者异质性更高，从而能带来更多元的信息。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讨论。

有学者发现强弱关系的效用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一项有关英国产业工人的就业研究发现，强关系特别是亲属关系才是这类人群在就业方面的重要资源，而这里强关系的作用关键要素并非信息，而是行动者之间强烈的责任感，使得其愿意全力相助对方的生计问题^③；同样的结果也适用于女性群体和其他弱势边缘群体^④。这就意味着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由于需求、网络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性使得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和最终所获得的支持存在较大差异。

（二）我国的社会网络与流动

在不同国别、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方式也存在差异。我国学者基于本土社会文化特征而提出了针对弱关系作用的质疑。边燕杰等提出，总体上看强关系才是中国文化情境下就业的重要资源。边燕杰等延续了格兰诺维特对强弱关系的界定，但是提出在我国社会文化和经济体制下，就业的关键资源并非是信息而在于人情，而只有强关系才是人情支持的重要保证，且并未受到市场化等机制变迁的影响而发生本质变化^⑤。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基于我国社会情境的强弱关系界定问题，由于网络间传递的是人情、信任而非信息，则需要进一步将强关系中的亲戚和朋友进行区分，将由血缘或姻亲组成的亲属关系称为强关系，将朋友关系称为中间关系，而将生活中能接触到但没有深入交往的相识关系称为弱关系。除此之外，进一步将社会网络的影响由仅关注就业而扩展到了情感支持、实际支持（物质、行

① 王毅杰、董星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刘娜 《关系网络与职业流动：西方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评述》，《经济研究导刊》2016年第3期。

② Lin N. ,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③ 刘娜 《关系网络与职业流动：西方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评述》，《经济研究导刊》2016年第3期。

④ 赵延东、王奋宇 《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⑤ Bian, Y. ,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s,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vol. 63 , issue 3 , 1997 , pp. 266 - 285; 边燕杰、张文宏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动支持) 和交往支持等流动人口生活资源需求的多个方面, 并通过对社会网络各类型关系的探究而呈现出流动人口资源调动能力的总体特征^①。从而彰显出社会网络研究在我国的鲜明本土情境特色。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讨论, 可以看出由于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群体特征, 我国的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研究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民工潮”而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重要议题。从宏观来看, 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并非仅有空间上的流动, 由于户籍制度和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等制度背景, 这也是其脱离原有社会网络, 建构城市社会网络, 从而获得新的社会位置和重构社会结构的过程^②。

从流动过程来看, 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可以分为流动之前在农村家乡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乡土社会网络^③, 以及流动之后在流入地形成的以业缘为主的的城市社会网络。既有的实证研究已经发现, 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显著区别于农村留守群体, 也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异, 但以亲缘关系为主的强关系依然是其社会网络中的重要构成, 明显高于城市居民、也高于农村居民^④。且强关系中的强关系(父母支持)所占比重上升明显, 深入的质性研究也表明虽然关系的紧密度没有变化, 但内部却已经形成了新的互动模式, 由传统的家长(父母)权威逐渐转变为父母对成年子女的资源倾斜和帮扶支持, 呈现出对成年子女核心家庭的“承托”作用^⑤。

因此, 从流动人口的双重社会网络来看, 由于从农村社区流出后较难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 其乡土社会网络中的中间关系和弱关系都显著下降, 仅保留了部分(以血缘为主)强关系, 而城市社会网络, 由于受到户籍制度、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等限制, 使得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区^⑥, 因此在关系网络规模、异质性方面都远远低于城市居民, 仍然较难从城市社会网络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 相比较于西方社会的迁移过程, 我国流动人口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强关系疏离的现象, 反而呈现出与血缘、姻亲关系互动的加强^⑦。

(三) 互联网技术的挑战

随着互联网技术作为当今社会的核心信息沟通途径, 其对社会网络的影响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 主要形成了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类观点。消极影响认为由于个体使用互联网的时间会挤占其与关系网络成员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时间或机会, 因而

① 王毅杰、董星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② 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③ 王毅杰、董星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④ 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⑤ 刘娜 《社会流动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分析: 以北京市流动人口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⑥ 李春玲 《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5 期。

⑦ 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 《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 2 期; 刘娜 《社会流动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分析: 以北京市流动人口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汪国华 《从内卷化到外延化: 新生代农民工工地创业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9 年第 8 期。

将不利于联网技术使用者的社会网络发展和社会资本积累，因此被称为“时间置换效应”；积极影响则提出由于互联网沟通具有匿名性、非同时性等特性，人们有可能获得新的社会关系也有利于对既有社会关系的维持，也即有利于对原有面对面沟通障碍的克服，有利于社会网络的拓展与维持，从而被称为“社会补偿效应”。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社会补偿效应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认同^①。

但积极效应的影响是否在流动人口群体中具有普适性呢？从互联网技术在其他领域应用结果来看，我们需要对此问题保持审慎的态度。仅以就业为例，已有研究发现了互联网技术的使用所导致的技能偏向现象，既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促进了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提高，而导致了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受到负面影响^②。因而作为低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互联网技术影响的积极或消极是需要进一步甄别的。而在社会网络方面相关研究已经发现，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过程与农村社区的疏离和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其社会网络特征也随之发生变化^③。

针对更广泛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主要作用于对已有强关系社会网络内部沟通与交流方式的替代，而不是创造出新的强关系。同时，互联网虽然能够拓展弱关系的范围，但这类弱关系也并不能转化成社会资本，难以带来实际效益^④。因此，互联网技术对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影响呈现出独特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并非单一的积极或消极判断即可解释。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已经全面突破仅限于个体行动者间沟通交流的范畴，凭借共享经济、平台用工等新经济、新业态而全面嵌入到流动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当中。

本文选取流动人口中受互联网技术影响最为深刻的平台服务业劳动者——平台家政工^⑤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考察以上问题，这部分劳动者的突出特征是互联网技术不仅作为其生活中沟通、娱乐的手段，更是其生计的基础和来源，可以较为全面和典型的反映出互联网技术的影响。本文的调查资料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基于2017年至2020年1月对30余位互联网平台家政工的半结构式访谈；另一部分来自于2020年5月开始的对家政工微信群展开的深度访谈^⑥，因为疫情的限制，这部分调查

① 黄荣贵、骆天珏、桂勇 《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一项基于上网活动的实证研究》，《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

② 潘丹丹、王子敏 《互联网、技能偏向与劳动力区域流动模式研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王子敏 《互联网、社会网络与农村流动人口就业收入》，《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③ 龚牟利 《新生代农民工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4年，第28页。

④ 王子敏 《互联网、社会网络与农村流动人口就业收入》，《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⑤ 平台家政业的分工与传统家政业类似，也包括小时工、住家保姆、月嫂、育儿嫂等多个家政工种。但综合来看，平台家政企业内劳动者数量最多、受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用工模式影响最大的工种主要是小时工，因此本研究所涉及的平台家政工主要以小时工为主。

⑥ 此部分的调查获得了凯风基金会“凯风沙龙·流动性工作”项目的支持。

全部以网络线上形式开展，目前共访谈了 25 人，包括群主、家政发单老师和日结小时工等多个群内主体类型，其中派单老师 2 人，男性日结小时工 2 人，日结小时工以女性为主，年龄分布在 45 岁 - 53 岁之间，总体较平台家政工年龄偏大，主要来自北京周边省份。以上访谈共获得访谈录音 40 多小时，并已全部转换为文字，并在文中按照学术规范做匿名化处理。

三、生活与生计：常态下的社会网络特征

近年来，传播学和社会学较为关注互联网技术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其中传播学主要从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沟通途径的角度，关注其对流动群体人际沟通、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影响。而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扩展，互联网平台经济成为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从而使得互联网技术从单纯影响日常生活、社交互动的沟通技术进一步拓展成为主导流动人口生计的工作技术，社会学特别是劳动社会学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开展了相关研究。

相关研究提出由于互联网技术与资本力量相结合，平台劳动较传统服务业更加广泛和严密地控制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从技术逻辑的角度，通过数据收集和算法设计，以提高效率为目标，更加严格和精准地设计和监督劳动者单位工作任务内的行为，从而导致劳动者逐步成为算法的执行者，而越来越难以掌握对工作的主动权^①；从平台规则的角度，通过工作时段、订单价格和劳动纪律等方面运营原则，使劳动者“自愿”在非正式劳动关系的基础上成为全职劳动者，甚至成为超时劳动者，也即“灵活用工的去灵活化”现象，同时由于平台运营中劳动者日常工作主要以消费者所在地为主，而与传统服务业相比难以形成正式稳定的沟通互动空间，因此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都存在关系更为疏离的现象，例如在平台家政中就存在明显的“姐妹隔离”的现象^②。也就是说，互联网技术所建构的平台劳动，不仅影响着劳动者生计领域的劳动过程，也通过劳动过程间接影响到其人际互动，也即其社会网络。这是在平台劳动时代之前，人们所未曾预见的，也是互联网技术成为流动人口社会网络重要影响维度的显著表现。

因此，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到，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已经突破社交领域而将流动人口全面卷入到了网络社会当中，成为其生活、生计的主导要素；另一方面技术对生活 and 生计的影响并非是割裂或隔离的，特别是对生计领域的影响将间接影响到从业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因此，在互联网技术将平台就业流动人口全面卷入网络社会的当下，其社会网络必定随着发生一系列改变。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结合社会网

① 孙萍 《如何理解算法的物质属性——基于平台经济和数字劳动的物质性研究》，《科学与社会》2019 年第 3 期。

② 梁萌 《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5 期；陈龙 《“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

络的分析路径，基于已有访谈资料，呈现此种变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乡土社会网络：强关系的强化

本文对社会网络中关系类型的分类主要使用基于本土特点的三分法。即强关系主要是指血缘或姻亲组成的亲属关系，将朋友关系、邻居关系等称为中间关系，而弱关系则是指生活中能接触到但没有深入交往的相识关系^①。既往对流动人口强关系的研究表明其并未因流动而导致关系的疏离，反而由于流动导致原有基于地缘的中间关系减弱而加强了对强关系的依赖，特别是在流动过程中需要物质、实际支持的时候强关系的强化现象就更加明显^②。在互联网技术将流动人口全面卷入的当下，其强关系强化的特征仍然明显：

我婆婆在老家里，我每个月挣钱都给婆婆，她给带孩子嘛。孩子也给。我自己也给家里孩子寄些吃的、衣服，给孩子买东西。（除了过年之外）也回家，有事的话就回家一趟，什么事需要你回家，不回不行了，就请个假回家待两天或者待一点，没什么急事就回来，有急事的话就多请几天假。（王姐，小时工，2019年1月访谈）

孩子在老家，奶奶给带着。就是因为大了，天天上学老不会，今天就问这一个题怎么做，因为奶奶有得也不会，天天视频，有一题不会做就拍张照发过来，然后再开视频，就给他讲，都已经二年级了。接过来没有办法带，两个人怎么带？本来租的房子也小，多一个都住不下，就是暑假的时候过几天也是挤着住。我老公还有一个弟弟，他家孩子也快出生了，我应该也干不了多长时间了。（小陈，小时工，2019年1月访谈）

由于离家外出的距离通常较远，原有流动人口与乡村家人的联系模式通常是以一年之中春节等重大节日才返乡的低频率互动为主，而现在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电话、社交软件等基于智能手机的沟通技术是他们之间的沟通的重要技术基础，农民工群体因为需要与孩子保持较为亲密和频繁的互动，从而也形成了与照护孙辈的父母辈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关系。而因此正是互联网技术所促成的虚拟互动形式，流动人口才能与其乡土社区的强关系保持较之前更加密切的互动频率和关系。同时，这种关系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父权制、从夫居等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特征：

因为我老公他妈没了，生了双胞胎没有人给我带，因为我爸妈也不给我带。然后我就回老家，他老家还有一个奶奶，70了那时候，她能帮我搭把手，然后我就回家了。我结婚了，不可能再跟我爸妈掺着了，掺着了意见特别大。（小范，小时工，2020年1月访谈）

上面提到的这位妈妈，由于婆婆已经过世不得不放弃平台家政工作承担起育儿

^① 王毅杰、董星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汪国华 《从内卷化到外延化：新生代农民工工地创业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8期。

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需要请丈夫的奶奶来协助,而女方的母亲却仍然未被提及或被邀请。不仅是上面这位年轻的双胞胎妈妈,我们调查的大部分家政工其子女都是由丈夫家庭中的祖辈承担照护责任的,也因此强关系互动的频繁与关系的密切尤其具体表现为与父系血亲关系的加强。

同时,在互联网技术与现代交通技术相结合更为以上强关系的维系和强化提供了更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孩子爷爷奶奶在老家带,平时电话,手机电脑联系。基本是每天视频。每天都和他们每天视频聊天,就是以学习为主之类的。半个月回去一两天,我们这挺近的,有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老家了。三个小时,坐普通火车。坐高铁就是一个小时就能到。(武姐,平台小时工,2019年12月访谈)

大孩子10多岁了,我们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生的小孩。孩子现在在老家,爷爷奶奶带。现在网络发达,可以视频的。我们这里离得近,自己开车回去也就4个小时,有时候想回去了就请几天假就可以回去,很简单的。(彭姐,平台小时工,2020年8月访谈)

从以上两位小时工的日常安排可以看到,与人们传统印象中农民工一年一度春节候鸟式往返的情况不同,由于互联网技术所支持的智能订票系统,以及高铁和高速交通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返乡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大大下降,流动人口返乡的频率明显加大,甚至足以成为一项日常的安排。从而从另一个层面促进了其与乡土社区强关系之间以面对面互动为主的关系维护模式。

因此,从以上家政工强关系的有关案例来看,在互联网时代,其强关系已经较上一阶段具备了更加强化的特征,而其强化的途径则既包括互联网技术所支持的虚拟互动也包括传统的面对面互动,强关系间的联络更加密切、真挚和具体,也即技术帮助流动人口克服了时空边界,从而能够与乡土社区的强关系开展全方位的互动,也因此进一步克服了家人间因分隔两地而造成的疏离,推动强关系的持续和强化。

虽然流动人口的强关系较之前有所强化,但其乡土社会网络中中间关系和弱关系的维持也同时被削弱了,既有研究已经发现流动人口在农村社区的中间关系和弱关系由于距离和时间的区隔,存在明显的弱化趋势。同时,与已有研究提出互联网技术对使用者社会网络的“时间置换效应”和“社会补偿效应”相比较^①,流动人口表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与弱关系互动的的时间置换效应,而与强关系则表现出社会补偿效应,也即此两种效应在流动人口的乡土社会网络中同时存在,只是作用的领域不同^②。

① 黄荣贵、骆天珏、桂勇 《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一项基于上网活动的实证研究》,《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

② 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 《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刘娜 《社会流动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分析:以北京市流动人口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二）城市社会网络

流动人口迁移过程中涉及两类社会网络的建构，一类是乡土社会网络，主要是在家乡农村社区，另一类是进城后形成的，可称为城市社会网络^①。也即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社区后也在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建立新的各类关系，这些关系以中间关系或弱关系为主，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乡土社会网络中关系的延续，包括老乡、朋友关系，这类关系得以延续主要是因为个体间在进城后由于职业关联或居住地临近而能够保持交往活动；第二类是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后由于生活和工作而结识的新关系，包括同事、客户、房东等群体。总体上看，流动人口进城后所建立的城市社会网络中，主要从老乡、朋友关系等中间关系那里获得陪伴、情感互动等方面的支持，主要的物质、重大决策等仍然依靠既有的强关系，而对于城市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因为很难转化为强关系，也因此难以成为可调动的资源^②。然而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驱动下，以及在疫情所导致的特殊社会情境中，我们得以发现以上关系的另一面。

1. 中间关系的工具化

在居住模式上，上个世纪末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大多聚集在一起居住，特别是表现为浙江村这样以地缘为纽带的聚居，并同时生计上形成合作关系，从而在日常的互动中有可能发展出基于老乡、邻居的属于城市社会网络中的中间关系^③。然而，目前从北京平台劳动者的居住情况来看地缘聚集的居住模式正在消解：

我们租的就是暗间，一个月四百一间，跟我老公两口子住的。出来哪有什
么老乡，很少也是，租的房子里有河北的，但是是搬过来才认识的。没有一块
出来的老乡。平时没有聚餐，谁跟你聚餐。有困难的时候也没人帮，就靠自己。
在北京也没朋友。也没遇到太大的麻烦，就是上班也有朋友。现在干这个都是
干自个儿的，没有说谁跟谁一块的，都是自己干自己的。（柳姐，平台小时工，
2019年12月）

邻居一般除了上班的时候出门或者是出门买一点东西，一般情况下是不出
门的。没事的时候，就在家就是喜欢看看手机追追剧。（小王，平台小时工，
2019年1月访谈）

正如以上两位被访者的居住情况一样，流动人口基本是以核心家庭的夫妇为一个单元居住，由于经济条件和租房成本的限制，仍然表现为在一个区域相对集中，但是内部的地缘纽带关系却已淡化，合作关系不似从前，特别是平台个体化、原子化工作模式下的流动人口，在生计方面已经不像以往如浙江村般需要得到老乡等中

① 韩叙、夏显力 《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与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② 王毅杰、董星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项飙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间关系的支持，不仅影响了其潜在的业缘关系的建立，也使得基于地缘的聚居在生计层面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因而流动人口聚居社区日趋与城市中的商品房社区一样成为“陌生人社会”。

当然，这类社区中的中间关系仍有一定的作用。在就业方面，虽然网络信息丰富，但流动群体更倾向于通过朋友、邻居获取相关就业信息：

因为我之前是从工厂里边上班，在那边辞职了以后就想来北京，当时找工作什么的没有学历是挺难找的，然后就是朋友介绍，有这么一个家政平台挣的钱也比较多，而且也没有那么累，所以就会接触到家政这一块。我老公他现在是在送外卖的。跟我在一个地方，我们就住附近。他也是听朋友说过，然后就推荐了直接去面试的，才做外卖的。（小王，平台小时工，2019 年 1 月访谈）

开始也是我老公八月份不干了，他就在家待着。我们那儿好多人都送众包，我说你也去注册一个送一下，挣 30 块钱也行。我老公比较老实，他不爱问人，有一天我旁边住了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他在送。我说众包怎么注册的，他说简单，你就下个众包软件就行了。（小范，平台小时工，2020 年 1 月访谈）

与早期流动群体主要依靠强关系介绍工作的途径存在较大差异，那时的介绍不仅提供的是信息更是其中的人情，是向与之相匹配向企业推荐或担保，才能使劳动者最终获得工作^①。而这一代平台从业的劳动者就业主要从邻居、朋友那里获得信息，之后会自己通过 APP 软件与平台建立联系，从而获得工作机会。因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重要的是信息的可靠性而非担保或推荐中的人情，也因此他们在就业过程中中间关系、弱关系也能发挥作用，从而打破了我国就业中强关系为主的一贯模式。

而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为何该群体仍然选择通过人际关系而非网络信息就业，以下这位外卖员的经历有一定的代表性：

就是找工作，X 同城上给我发招聘信息，你们就全去。给我带到一个大写字楼，给你介绍这个怎么怎么样，先交几百块钱。其实我感觉特别傻，可能是没有阅历吧。然后我朋友就说，出去你是挣钱的，你一分钱没挣呢，你先搭出去了。然后后来就回来了，因为大哥之前在这干外卖。在附近找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后来去干美团吧，就一直在干美团。（小段，外卖员，2019 年 12 月）

从中可以发现过于丰富的网络信息使得流动群体难以分辨其良莠，而朋友、邻居基于自身经验的介绍更具有可信性。因此，即便在互联网技术如此发达的现在，在找工作的主流资源来自于强关系的中国，流动人口平台就业信息途径却是以中间关系和弱关系之间的信息传递为特征的。但其也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渠道，并不会提供更进一步的实际资源或支持，这与传统中间关系会提供情感支持等资源差异较大，

^① 边燕杰、张文宏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2 期。

相对而言呈现出工具化的发展趋势。

2. 常态下弱关系的解构

通过工作而获得的社会网络是流动人口城市生活中城市社会网络的重要来源，一般表现为弱关系。在平台就业中，主要涉及到平台企业、客户、同事等几类人员。其中，与平台企业的关系，由于平台就业仍然从属于非正规就业，企业和劳动者签署的是信息服务协议或者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工作，因此二者之间没有形成正式的劳动关系，劳动者对企业的归属感以及平台所提供的资源都非常有限。同时企业作为非自然人也难以计入到社会网络中。因此流动人口在平台就业中主要涉及到与客户、同事之间的关系。

就是感觉做保洁，和人接触的就是，最多和客户接触两三个小时比较好，就是属于那些住家里边有地方要帮忙的，这样就是比较好沟通吧。反正我自己不怎么说话，所以我就不喜欢跟人沟通那么多。就是如果做月嫂可能家里边有老人，比较难处理的。所以小时工不住家比较自由。（小王，平台小时工，2019年1月访谈）

正如以上这位平台小时工所说，平台就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工作地点、工作对象更具流动性，特别是外卖员、小时工等典型平台劳动者，其与客户之间的互动存在时间短、一过性的特点，大部分客户的关系都是随着单次订单完成而结束，这部分连基本的关系也难以建立起来，尚不足以形成弱关系。另一部分则是发展为某一小时工的长期客户（业内称为周期订单或者老客户），由此才有可能建立起弱关系。

我干（小时工）的是老客户，我是一家跟着一家走，我下家干五六个小时，我上一家干四个小时，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我有时候（在客户家）做饭，她说阿姨咱们今天晚上做饭吃，我顺便把我的饭带出来，她要是不做，就会说阿姨，冰箱里有饭你自己热，因为我的客户跟我三年了。（客户搬家）我基本都是跟着，要不为什么干到通州了，我手里客户基本上都是跟着，他搬家我也跟着，也有一个部分原因因为这个涨价的，搬家了，他说阿姨我给你涨工资，我给你涨你就跟着我。（邹姐，微信日结小时工，2020年5月访谈）

通过将单次订单发展为周期订单，家政小时工得以与客户建立起长期合作的关系，虽然二者的合作周期会比较长，但关系却难以随着时间而有所突破，仍然以“人走茶凉”式工具性的弱关系为主，一旦二者合作关系结束，弱关系的延续也将面临很大挑战。此特征与既有研究对流动初期相关人群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既流动人口的弱关系，特别是异质性较强的与客户、老板的弱关系很难维系和发挥效应。

而平台劳动者也因为基于互联网技术设定的个体化平台管理运营机制无法得到与同事们形成超越弱关系的互动机会。

一方面从管理角度来看，平台企业以线上订单一对一分派为主，此外平台企业

在城市的不同区域会以小范围内形成小组的形式，辅助管理劳动者的日常劳动，其中较为资深的劳动者被委任为组长，主要通过微信群组联络，承担对其他组员的信息传达、答疑解惑或团建等任务。但是由于各自工作繁忙，以及订单等工作任务主要以个体为单位下单和履行，因此小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

跟同事之间有交流但也没什么事，把你的工作干好就行了，遇见什么事，就会告诉领导（组长），出现什么问题让领导帮你解决。平时联系少，没什么事也就不联系了，有事联系。（平时需要回公司吗？）我们这只要有什么事，就报告组长，公司基本上不去。有什么事会微信通报告诉你，也没什么大事。都是工作上的事，也没别的什么。（王姐，平台小时工，2019 年 1 月访谈）

我这个组长也挺好的，我们一起住，她毕竟是我老公的师娘，挺好的。很熟，要是一般的组长我也不会说的，挺熟悉的，那没问题，像我一般我不懂的，我刚做，都不懂的，向她问一下。（武姐，平台小时工，2019 年 12 月访谈）

因此，平台企业为了组织劳动而设立的小组组织，虽然设立有组长职位，但是并不是标准的科层制组织，组长没有奖惩的权利而主要是经验分享和上传下达的信息渠道，而组员内部虽然也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建立起了虚拟社群，由于日常工作各自分散、缺乏互动而难以建立起深入的关系，访谈中唯一例外的劳动者与组长之间形成了信任和紧密的关系也并非源自于工作。因此，相比较于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朋友、老乡等中间关系曾经是流动群体情感支持或陪伴支持的主要来源，现阶段互联网技术所设计的平台劳动机制会使得的这类原本具备成为中间关系基础的业缘关系，退而成为点头之交：

现在一个人，单租的房子。像平常基本上大多数这一个区域的话，它有四个站，然后一个站就是六七十个人。一个站六七十个人，基本上四个站，设了四个站。基本上都认识，平常都取餐，包括送餐的，平常打个招呼。假如中午送写字楼，办公楼的话，你从电梯上不去，我上去的话，可以带一下。（小甘，外卖员，2019 年 12 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上由地缘纽带所形成的城市中聚集居所可能带来的中间关系，正在随着居住模式的去地缘化而式微，流动群体目前主要以核心家庭需求为主要居住安排而非追随老乡和朋友，那么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工具化了。而另一方面平台就业作为业缘关系的基础实际上是建构城市社会网络的重要渠道，但是由于平台劳动的劳动时间特点和组织管理特点，反而进一步解构了传统服务业中劳动者之间的面对面社交而形成更进一步关系的可能，平台劳动者生产中的个体化、原子化的特点在生活中的也越发凸显。

四、作为结构性危机的疫情与弱关系的复归

通过对上一部分互联网技术影响的流动人口平台就业中的相关社会关系的分析

可以发现，互联网技术从沟通和就业两个方面深刻地建构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使其强关系强化，而使中间关系工具化、弱关系解构化，从而使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交网络更加的萎缩，个体劳动者在生计和生活两个领域都面临着个体化、原子化的挑战。同时，结合我国社会“差序格局”特质以及既有研究对强关系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一方面，以上情况将预示着不利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持续发展和社区融入，另一方面，由于弱关系在日常状态下的有限作用，一直以来相关研究也都忽视了对它的关注和深入讨论。也即，通过日常田野的观察，我们只能慨叹互联网技术发展大大地削弱了劳动者建立中间关系的可能性和转化弱关系的机会，但却并不清楚其深层次的影响是什么。然而伴随着疫情的发生，整个社会的交通、经济运行和社交暂时停止，形成了一种去技术化影响的真空效应，反而客观上成为了观察的重要时机。以下本文将通过疫情当中，家政工如果受益于社交网络中的相应支持，渡过疫情这种外在、客观和全面的社会危机而尝试展现之。

2020年1月中旬到4月正是新冠疫情最为胶着的时期，在这过程中，平台家政以往所依赖的社交网络几近失灵，一方面人际互动层面，全国交通基本停滞，以往便利的返乡之路被切断，家乡社区的强关系所提供的庇护支持功能在此时失去了作用，返乡的途径和乡村强关系的支持基于疫情的隔离要求被阻碍，时空边界再次成为获得社交支持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从平台就业的角度，为了响应政府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的倡议，大部分平台企业暂时关闭了派单系统，特别是家政、网约车等需与客户密切接触的行业，即便是劳动者自组织的微信群都发布了“禁单”通告，劳动者也因此失去了就业信息和就业渠道。因而在疫情过程中，这部分流动群体特别是滞留城市的群体生计生活面临重大挑战。然而在我们的5、6月份的调查中却并未发现有人因此而流离失所或陷入困境。那么当家乡的强关系支持无法触及而平台的生产资源也同时停滞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支撑其渡过疫情难关？

虽然总体上无论在家乡还是滞留北京的日结小时工都面临着挑战。但显然滞留北京的这部分小时工生计和生活的问题更严峻也更紧迫，由于城际交通中断和对流动的严格控制，她们难以回到家乡，必须在北京直面困难。访谈中，几位一直留在北京的小时工分享了她们的经历：

我之前刚来北京那会儿没有地方住，我就去家政公司找了一份住家的活。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女主人带着儿子去了武汉，19号去了那边23号就“封城”了，本来她说去那待十天然后再回来。她是19号出去的，我18号接了一个春节替班的活，就替十几天吧。人家阿姨来家了，我必须得下户了。但女主人去了武汉回不来了，我这边也就回不了他们家了。因为这家男主人是两口子离婚了，女的是离婚没离家，男的单独在家家了所以我也进不了原来的那家了，他就帮我找了一家。然后人家把我接回家，也是男主人和他说了这些事，所以他也没问（行程和防护等）。干了一段时间。（微笑姐，兼职日结小时工，2020年5月访谈）

微笑姐在男主人介绍的这家做了两个多月的护老工作，工资和之前在男主人家一样，一直到疫情缓和，她从介绍的那家客户那里下了户又重新做回日结小时工。

另一位在疫情期间滞留北京的小时工，则在家政门店住了接近三个月：

之前我在家政公司，我始终在家政公司里住，因为下午的班是个白班，就是做三小时的。因为在家政公司找的（小时工），所以说家政公司让住。一天十块钱。四十多平，最少的得住五六个，七八个，有时候还有二十多个。（疫情期间）它这个家政公司没关门，因为它是写字楼，也没有居民。因为我过年没回家，始终在那待着。如果关门了我就没地方去了。老板也说过，别的公司都关门了。疫情缓解后4月中旬，因为家政门店的客户取消了，感觉我只做日结微信群小时工，我对他没有利益了，所以就不让我在那待着了。后来老师就说了，都不能在那待着了。（魏姐，微信小时工，2020年5月访谈）

原则上疫情期间所有写字楼和门店都要关闭，但是应该是考虑到这批员工的特殊性，一直没有被通知关店，使她们得以以每晚10元的低廉价格度过了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从而避免了流离失所。而疫情缓解后，家政门店即回复了商业利益的考虑，由于魏姐没有这家店客户的单而只在公共微信群里接单，门店就不再允许已经没有合作关系的魏姐再占用其住宿资源，魏姐联合小时工姐妹合租。

另一位主要做老客户业务的小时工，自己在京租房，疫情期间靠老客户的信任获得了基本的收入：

我一直工作到阴历29。我平时主要是固定的，固定几家，然后还有剩余时间接散的。疫情期间就是做的很少，一直到4月初，主要是固定的。那段时间我就跟你说，偶尔做一家也是老客户，一个月能做几家，基本这两个月收入很少，微薄的收入。老客户家也就是偶尔做一下。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扫码了，证明你在北京14天，完了我们才进去做的。因为我的老客户就问我了，他知道我没回老家，一直在北京了，心里有底，因为不想找其他的阿姨，我们都是合作过几年的，他比较放心，知道我一直在北京，他也挺注重这方面的安全，进去用酒精消消毒，戴口罩。（温姐，微信日结小时工，2020年5月访谈）

在家乡的小时工，因为没有收入，也时刻关注着能否回京复工：

老在家待着也不挣钱，光花钱，我那时候给房东打电话问回去行不行？他说回去得隔离，那我觉得在家也是待着，那就回北京待着去吧，隔离14天之后找点活挣点零花钱，够个吃饭的就行。那时候还真没担心（路上被传染），当时在群里问去北京需要什么证？当时说不需要，我们什么证也没带直接就来了。好像在火车上快到北京的时候，说是下载什么京心相助，然后就下载了一个。到村里反正是房东领着进去了。当时打电话就说了得房东领，到了隔离14天，办一个出入证。（李姐，微信日结小时工，2020年5月访谈）

所以对于回京的小时工来说，回京复工的信息是小时工群内在京的群友们提供

的，而最终落地进入出租屋则是房东出面接人、担保和协助办理出入证明的。

因此，回看以上几位小时工克服疫情挑战的经历，能够看到由于疫情的突发性，正式的制度资源未能及时考虑到这一人群的需求从而提供保障或支持，而中国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的亲属关系也因时空距离而大部分失灵，疫情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危机被整个社会所认知和感受，所有人都不同程度的困于整个场域当中，从而使家政工们的弱关系主体对其困境更明确也更容易同理与共情，因此最终支撑小时工们走过来的竟是待上户的客户、家政门店、老客户、房东以及家政姐妹这些在目前城市社会网络中从属于弱关系的交往主体。

特别是客户们和家政门店，在疫情之前二者的关系类型主要是经济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客户无需为小时工不能上户负责，家政门店一旦和小时工的合作终止也会将其退出住宿名单，而在疫情期间他们则自觉承担起了为家政工背书推荐等责任从而保证其基本的生活，家政门店也在聚集等风险下为小时工持续提供廉价住宿。从而使大部分小时工虽然滞留在外，却仍然安然度过危机。使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经济利益交换的背后，虽然常态下是维持“人走茶凉”的解构化弱关系，但其表象下仍然尚存一息“买卖不成仁义在”的人情道义责任。

家政工城市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在常态下以“人走茶凉”的关系为主，另一个方面在某种危机情况下则以“买卖不成仁义在”的道义责任为主。因此，这里的弱关系并非是一般意义上被互联网技术单纯地解构，而是使其道义责任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被蛰伏，又因疫情而启动。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互联网技术对平台家政业劳动者社会网络的影响是全面且深入的。

在常态下，互联网技术对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改变呈现出明显的强关系更强、弱关系更弱的两极化特征。在乡土社会网络方面，由于现代互联网通讯技术、高铁高速等交通技术提升了流动人口与其家乡亲人之间日常虚拟交流的便利性以及返乡面对面互动的高频率与常态化，有利于其延续和推动与家乡的强关系，并由此保证核心的资源和支持，但同时其与乡土网络的中间关系、弱关系都弱化了；在城市社会网络方面，曾经作为提供情感支持或生计链条存在城市社区中的远亲、邻里等中间关系，由于居住偏好的改变和平台劳动所导致的个体化，使得这类关系所提供的支持仅限于就业信息等方面的工具化性质，情感或实际资源支持等实质功能趋于消解；在弱关系方面，虽然互联网技术拓展了平台家政从业者与客户、中介等弱关系主体的互动渠道，但是在常态下这类弱关系主要呈现为经济理性，互动双方以经济交易为主，不具有提供其他资源和支持的可能性，表现出解构化的特征。

在疫情中，当疫情作为一种结构性危机发生之时，这类弱关系却呈现出与常态下截然相反的表现，为家政工提供了关键性的生活和生计资源支持，由“人走茶凉”的经济理性关系转化为“买卖不成仁义在”的道义责任。因此，虽然互联网技术明显地改变了平台家政群体的整体社会网络，但其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显然显示出更突出的特征，也即该弱关系常态化下的解构仅是其特征的一个层面，互联网技术对弱关系影响的本质是使其处于一种“蛰伏”状态，一旦条件具备其将有可能启动为支持资源，呈现出弱关系的二重性特征。

当我们进一步思考社会网络的机制时，会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显性的互联网技术影响，它通过对时空边界的压缩、对生计模式的颠覆，提供了人们加强关系或减弱关系的必要手段和社会背景；但同时另一条隐性线索也在共同形塑着这类群体的社会网络，这就是社会网络中强关系、中间关系和弱关系三类关系的互动，田野材料中常态化强关系的加强与其他关系的减弱，以及危机下强关系的失灵与弱关系由“蛰伏”到“启动”的转变，都让我们看到似乎存在一种社会共识，既在人们心中存在着对不同关系发挥作用的一般社会情境与次序，以及各类关系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互动机制的可能性。具体到本文来看，文中所呈现案例至少使曾经被认为是平行且独立的三类关系进一步可被澄清为存在互相牵制的互动模式。

因此，我们看到互联网技术对家政业劳动者社会网络的影响是表现在各类关系上的全方位综合性的变迁。而具体地看，相对于已有研究对各类关系“增加、减少或维持”的单向度判断，我们发现仅用强度来观察与分析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是片面的，特别是难以解释疫情情境下的相关事实，因而通过呈现其生活与生计的丰富背景和经验，尝试辨析与归纳各类关系的本质特征，从而最终勾画出该类群体社会网络的多重特征，也体现出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网络影响的复杂机制。

而反映到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维度，这提醒我们对社会网络中关系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反思其中割裂、一维的视角，不能仅止步于对其形式上的程度呈现与线性的变迁分析，而应进一步探索其显然更加丰富和复杂的内在互动机制。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北京市互联网+服务业和谐劳动关系建构及社工实务干预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SRC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研究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5 • We must Speak , even if to Repeat Cassandra's Fate An Addr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latform ,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ang Xujun

8 • Platform as A Method: Labour ,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Sun Ping ,Jack Qiu Linchuan ,Yu Haiqing

As a new form of technology , platform economy reconfigures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 unprecedentedly. What is the platform? What are the main research concepts and framework? What kind of opportunities does platformization bring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 the current article combs through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research themes related to platforms ,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labor , so as to examine and reflect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cope of platform society in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Employing platform as a research method , it brings out three approaches of platform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 that is , platform as media , technology and capital.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has both its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tatus of platform economy research indicates more critique than reconstruction. How to effectively combine local contexts with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expand the imagination of platform research becomes a key issue in future platform studies.

25 • Social Network Transitions of Platform Domestic Work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Liang Meng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reshaped the social network of platform worker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ocial networks of platform domestic workers in normalization and epidemic situation of COVID - 19.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ocial network of platform workers showed a polarization , where the strong and weak relationship to opposite direction Und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 the weak relationship has changed from economic rationality to moral responsibility , which has become the main support resourc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Based on this , this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potential presupposition of parallel and independent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relationships in the past.

41 • How are Virtual Communities Organized? The Case of a Truck Driver Platform

•Liu Xue ,Ren Yifei ,Liu Jinlong

More and more virtual communities have emerged on the Internet. They have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